

近年来,随着“考古中国——红山社会文明化进程研究项目”的持续推进,原来被视为红山文化“边缘”地区的河北北部,却因平泉东山头、宣化郑家沟等重要遗址的考古发掘,成为牵动红山文化研究新进展最“敏感”的区域之一,尤其是郑家沟积石冢的发掘,引发学界广泛关注。

郑家沟遗址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目前公开披露的材料以积石冢为主,至少有以下三个特点:其一,积石冢数量多,超过百座。其二,个别积石冢体量大,如一号冢面积近1500平方米。其三,年代较晚,碳十四测年显示,郑家沟一号积石冢的绝对年代大致在距今5300~4800年。有研究者指出,郑家沟遗址的考古新发现具有突破性,意义重大(朱乃诚,2026)。

当前学术界对郑家沟积石冢的认识

由于郑家沟积石冢所在地理位置较为特殊,出土遗物特征鲜明,学界有识之士对此类遗存的文化性质判定颇为慎重,目前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主持郑家沟遗址发掘的龚湛清先生认为郑家沟积石冢相关遗存可能属于一种独立的考古学文化。发掘者认为,郑家沟遗址虽然有以积石冢和玢形玉龙为代表的红山文化典型遗存,但年代较晚,且积石冢建筑结构、玉石器的区别均与辽西地区红山文化有异。陶器方面,既有本地新石器时代中期仰韶文化传统,又与河套地区白泥窑子、庙子沟文化相似,且没有发现筒形器、塔形器等辽西地区红山文化积石冢典型祭祀陶器,因此,这批遗存并非单纯的红山文化,而是红山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与地方文化相适应产生的新变化,可考虑称之为一支独立的考古学文化。

第二种,著名考古学家郭大顺先生认为郑家沟积石冢相关遗存属于红山文化晚期的一种区域类型,可称红山文化郑家沟类型。郭先生指出,郑家沟积石冢与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积石冢相比,属“小异大同”：“小异”如积石冢上无成行排列的筒形器,夹砂筒形罐和彩陶风格近于小河沿文化,且有大量蚌质及绿松石、天河石珠片等装饰品,但“大同”因素是主要的,如选址在山岗、积石冢结构和随葬玉器等。相关差别应与年代早晚和地理环境不同有关。

以上两种认识虽然都认同郑家沟积石冢相关遗存与红山文化的密切联系,但其实有本质的区别。对于第一种观点,由于发掘材料尚在整理之中,还没有正式公布,尤其是陶器材料如何体现出“红山文化”与“本地文化”融合创新等细节不得而知,因此,我们对此暂时持保留意见。但需要指出的是,在郑家沟积石冢相关遗存发现之前,来自内蒙古岱海地区庙子沟文化的相关遗存已经在冀西北地区的雪山一期文化和午方类型中有发现(段宏振,2022)。我们的认识与郭先生提出的观点基本相似但略有不同:郑家沟积石冢等遗存属于红山文化晚期的一个地方类型,不过这里的“红山文化”并不是指“老红山文化”,而是“新红山文化”。

“老红山文化”与“新红山文化”

所谓“老红山文化”和“新红山文化”,是我们在对郑家沟积石冢发掘材料披露之前,学界关于红山文化两种不同认识的临时称谓。“老红山文化”体系,是学界大多数学者对红山文化的认识,以郭大顺、朱延平、陈国庆、朱永刚、张星德、赵宾福、刘国祥等诸位先生为代表,即认为红山文化从距今6500年开始,到距今5000年结束,大致经历了1500年。虽然各位先生对红山文化所持分期方案并不完全一致,但“三期说”已逐步成为学界主流认识:早期以西水泉第一组遗存为代表,年代距今约6500~6000年,与半坡文化和后冈一期文化大致相当;中期以西水泉第二组遗存为代表,年代距今约6000~5500年,与庙底沟文化大体同时;晚期以牛河梁第三组遗存为代表,年代距今约5500~5000年,与庙子沟文化基本同时(赵宾福、薛振华,2012)。虽然在纵向时间发展方面,持“老红山文化”认识的诸位学者立场基本一致,但在横向分布范围和具体内涵方面,实则有广义和狭义之别,如刘国祥先生认为哈民忙哈、南宝力牟吐等遗址发现的遗存均可纳入红山文化的范畴(刘国祥,2016),而朱永刚先生则建议将这些遗存与红山文化区别对待(朱永刚,2016)。

“新红山文化”体系,是学界少数学者的见解,由原来持“老红山文化”体系的赵宾福先生于2017年首次提出(赵宾福,2017),并于2024年系统论证(赵宾福、任瑞波,2024)。即根据分布范围、延续时间、文化内涵等诸多方面的共性,将“老红山文化”和原“小河沿文化”合二为一,统一整合纳入红山文化的范畴。“新红山文化”大致延续了近2000年,从早到晚分别经历了“红山文化魏家窝铺期”或“后冈期红山文化”(距今6500~6000年)、“红山文化西水泉期”或“西阴期红山文化”(距今6000~5500年)、“红山文化牛河梁期”或“西王村期红山文化”(距今5500~5000年)和“红山文化小河沿期”或“庙底沟二期红山文化”(距今5000~

4500年)。“新红山文化”提出的初衷,是尝试破解在“老红山文化”体系下,长期以来红山文化牛河梁期只见于牛河梁、东山嘴、半拉山等遗址发现的坛、庙、冢为代表的高等级墓葬和祭祀遗存,而不见与之对应的生活聚落和同时期“平民”生活居址与墓地的现实难题。

郑家沟积石冢宜纳入“新红山文化”体系

我们认为宜将郑家沟积石冢等遗存纳入“新红山文化”体系中的晚期地方类型,理由如下:首先,在时间范畴上,郑家沟积石冢的年代大致在距今5300~4800年,已突破了“老红山文化”的年代下限——距今5000年,但恰好属于“新红山文化”牛河梁期(距今5500~5000年)偏晚阶段和“新红山文化”小河沿期(距今5000~4500年)偏早阶段的年代范畴。已有材料初步显示,与辽西地区牛河梁积石冢(群)类似,郑家沟积石冢(群)经历了长期的营建和使用,有进一步分期、段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我们推测,在燕山以南,距今4800年可能并不是郑家沟遗存的最晚年代下限,不排除今后还会有更晚相关遗存的发现。在燕山以北,距今5000年似乎是各类红山文化积石冢年代下限的“底线”和“红线”,但从已有的线索看,下限突破距今5000年相关材料的发现和公布可能只是时间问题。总而言之,“新红山文化”小河沿期(距今5000~4500年)可以容纳燕山南北两地以郑家沟积石冢为代表的或较其更晚的同类遗存。其次,在文化内涵上,郑家沟积石冢出土遗存兼具“老红山文化”和原“小河沿文化”的特征,符合“新红山文化”牛河梁期和小河沿期的文化面貌。郭大顺先生和发掘者对郑家沟积石冢的文化性质判断虽有分歧,但都认为郑家沟积石冢与辽西地区“老红山文化”晚期积石冢共性颇多。另外,郭大顺明确指出,郑家沟积石冢发现的夹砂筒形罐和彩陶风格接近小河沿文化。我们也注意到,在已披露的资料中,郑家沟一号积石冢出土的网格纹平底筒形罐与老“红山文化”典型筒形罐相异,但和原“小河沿文化”的典型筒形罐相似。辽宁半拉山积石冢(熊增瓊,2017)JK4出土筒形罐也属于这种情况。2024年,吉林大学 and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等联合发掘了赤峰喀喇沁刘家梁遗址,在部分遗迹活动面同时发现了小河沿文化和红山文化陶器共存,此类遗存的年代恰好在距今4800年左右。虽然我们暂不清楚郑家沟网格纹平底筒形罐的具体出土情境,但这一发现再次清晰地显示出,“老红山文化”与原“小河沿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应当引起足够重视。以往有些学者在分析红山文化和小河沿文化共存或共见的相关遗存时,会第一时间将二者分开,现在看来这种做法不一定准确。

最后,在文化格局上,将郑家沟积石冢纳入“新红山文化”的范畴,有助于合理解释距今5000~4500年燕山南北两地的文化格局发展趋势与动态。如果认同郑家沟相关遗存属于红山文化晚期地方类型这一观点,那么就有一道必答题需要认真考虑:在距今5000~4800年,是红山文化在其他区域都已消失仅存“郑家沟类型”,还是燕山南北两地依然存在其他红山文化遗存?如果有,可能是哪些?如果没有,应如何考虑燕山南北同时期相关遗存如原“小河沿文化”、雪山一期文化、午方类型等与郑家沟类型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形成这种文化分布格局的动因?回答这一系列的问题,如果还是以“老红山文化”为基准,部分问题的回答难度系数会很高。根据现有的考古材料和研究成果,可知距今5500~5000年辽西地区“老红山文化”和原“小河沿文化”共存,前者遗址数量多、分布密集,各型积石冢常见,后者遗址数量少、分布稀疏,单个遗址面积小,难道是“实力弱小”的小河沿文化将正处于“实力巅峰”、文明阶段的红山文化逐步排挤出辽西地区,导致距今5000~4500年小河沿文化独占辽西地区,红山文化在燕山北绝迹、在燕南继续发展?如果换个思路,以“新红山文化”为前提,从逻辑上很多问题将迎刃而解。因此,我们的初步意见是,在距今5000~4500年,燕山南北两地相关遗存的具体文化面貌可能并不完全相同,但文化性质和发展进程基本一致,都可能与红山文化的日益扩散和红山文明的逐步衰落密切相关。

结语

郑家沟积石冢的发掘在很多方面都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对“新红山文化”而言,不仅是用考古材料实证了这一学术观点的可信度,而且进一步拓展了“新红山文化”牛河梁期和小河沿期的文化内涵和地域范畴。相较“老红山文化”,“新红山文化”提出的时间虽短,也有需要完善之处,但能从另外一种角度提供新的认识方案,以郑家沟积石冢遗存为代表的诸多考古新发现“答疑解惑”。

【本文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专项项目“边疆考古与中华早期文明研究”成果(项目批准号:2022JZD2024)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考古学院】

阴山长城沿线战国时期居民的变迁

——赵国北疆人群的族性与种系

战国晚期,赵国辟地千里至阴山下,修筑赵北长城,自此赵国拥有了广袤的北疆。赵国对北疆的积极经略,奠定了秦统一前夕北方的基本格局,不仅创造了阴山一带新的文化风貌,而且深刻影响了这一地区人群结构及成分的变化。赵国北疆人群的族性与种系,既是阴山长城沿线战国居民构成的主体内容,同时也是东周以来北方边裔人群变迁的一个重要环节。

赵国开辟北疆至阴山下

赵国是东周时期地跨中原与北方的大国。战国之初,赵国即北拓至桑干河流域的代地。至战国晚期赵武灵王时,实施胡服骑射之策,北路胡地千里至阴山下。赵北疆的核心地域包括阴山南麓至大同盆地,属于北方地区的中心地带。

赵国经略北疆主要包括4项内容:其一,修建阴山长城,自此开启了秦汉及以后历代修筑与维护长城、北拒外族的先河;其二,设置云中、雁门、代郡等三郡,以此构建起阴山长城沿线的城邑村落及边塞障城集群;其三,与诸戎部族全力融合,与诸胡部族对峙与疏远,同时促使中原居民迁徙北上,由此极大改变了阴山南麓的人群结构;其四,以北上的中原居民为基础和依托,变革随畜牧徙之俗,某种程度上转向农畜、耕田及城郭。

赵国北疆的开辟与经略,其首要根本在于北疆地区人群结构及成分的巨变。关于东周时期阴山南麓的边裔居民,文献典籍缺乏系统的记载,且内容多有舛错与歧义。20世纪60年代以来,阴山长城沿线的东周考古学探索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为讨论赵北疆人群的族性与种系,提供了丰富而翔实的资料基础。

赵国北疆人群的族性构成

赵国北疆人群的族性分辨,其名号来源于典籍文献之记载。战国之初赵国占据代地,这一带边裔人群的名号属于戎狄,具体又称之为:北戎或代戎、北狄或代狄。战国中、晚期阴山长城沿线的边裔人群名号,与赵国密切相关的主要有:林胡、楼烦和匈奴等。《史记·匈奴列传》:“赵武灵王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李牧杀匈奴十余万骑。灭襜褕,破东胡,降林胡。”这些名号并不完全等于族群或族性,但以此为基础大致可以辨识与区分出不同的人群。

在《战国策》与《史记》中,林胡、楼烦与东胡又统称为三胡、诸胡。《史记》与《汉书》等又常将“胡”与“匈奴”混用并称,但战国时期的诸胡与秦汉时期的匈奴并不完全是一回事。武灵王时似乎有三胡而尚无明确匈奴,其后北方诸胡之中开始出现匈奴,抑或者是将其中某胡改称之为匈奴。匈奴的含义似乎更具体一些,胡多用于泛称。至李牧时,具体的匈奴名号出现,并与东胡、林胡并列。

综合典籍记载的各类线索,赵国北疆地区的边裔人群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战国初期,主要是北戎、代狄,其中已经开始出现诸胡。战国中期至晚期,诸胡逐渐成为阴山—燕山一线的主体人群,赵与诸胡之间或交战或联盟,其中所涉主要是林胡、楼烦两支。与此同时,北疆又涌入大量的中原居民,其与戎狄、诸

田建文

1980到1983年,国家文物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专业共同组成晋中考古队,在黄景略、张忠培、王克林三位先生的指导下,以太谷白燕遗址为基地,发掘白燕和汾阳杏花村遗址,调查和试掘了汾阳、离石、娄烦、孝义、柳林五个县市区,培养了70余名实习学生,毕业后他们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为中国考古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1980、1981年分4个地点三次发掘的白燕,发掘面积近3730平方米,清理出仰韶晚期、龙山、夏商至西周晚期的文化遗存,从距今5200多年到距今2800年共2400年的考古学文化。发掘成果先是发表于《文物》1989年第3期的《山西太谷白燕遗址第一地点发掘简报》《山西太谷白燕遗址第二、三、四地点发掘简报》两篇简报,期待已久的完整考古资料《太谷白燕考古》已于2026年6月由故宫出版社出版。

这部四册150余万字的考古报告,是中国考古学史上发掘和研究的范例。在《太谷白燕考古》出版之际,我也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谈一谈。

苏秉琦先生怎么看待白燕？

苏先生在1975年提出、1981年发表的“区、系类型学理论”,将中国考古学文化分为六大区系,其中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区,和以关中(陕西)、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之后,将白燕发掘成果纳入他的研究重点。1985年8月份他就画了一张示意图(图1),又写下了《晋文化颂》四句自称的“歪诗”。11月他在侯马举行的“晋文化

赵国北疆人群的族性与种系

胡等错居融合,同时赵、燕又大力向北拒胡,是为赵北疆人群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至晚自战国末期始,诸胡之中的匈奴日渐兴盛,其形成或是单纯来自更远的北方,抑或是外来者与本地某支胡的合流,虽然其中的溯源途径与交错轨迹尚不十分清晰,但诸胡与匈奴之间分野的态势渐趋明朗化。

赵国北疆人群的种系识别

赵国北疆人群种系的识别,是基于考古学与人类学的综合研究,并以现代亚洲蒙古人种为基础的比较,尤其是其中的东亚和北亚两个种系类型。赵国北疆地区发现了大量东周时期的墓葬,根据墓葬人骨形态测量数值所反映的种属类型,大致可分为以下4组。

毛庆沟—饮牛沟组 典型墓地有凉城毛庆沟、饮牛沟等,主要分布在岱海附近及浑河中游谷地一带。该组人骨的种系类型,以东亚蒙古人种为主,含有部分北亚蒙古人种、极少量东北亚和南亚蒙古人种的因素。

新店子组 典型墓地有和林格尔新店子、清水河阳畔、杭锦旗桃红巴拉等,主要分布在东流黄河两岸和浑河中下游地区。该组人骨的种系类型,以北亚蒙古人种为主,含有少量东亚、南亚蒙古人种的因素。

忻州窑子组 典型墓地有凉城忻州窑子、崞县窑子、小双古城等,主要分布在岱海附近地区。该组人骨的种系类型,既有东亚蒙古人种因素,又有北亚蒙古人种成分,两种类型的群体共存于一个墓地。

土城子组 典型墓地有和林格尔土城子、将军沟、清水河后城嘴等,主要分布于土默特平原南部边缘及和林格尔丘陵地区。此组人骨的种系类型,以东亚蒙古人种为主,含有部分南亚蒙古人种和少量北亚蒙古人种的因素。

上述4组反映了赵国北疆人群的种系分类,其基本框架包括两大群组:东亚群组以毛庆沟—饮牛沟组为代表,另包括土城子组;北亚群组以新店子组为代表;忻州窑子组则属于两大群组的混合型。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战国晚期阴山南麓出现的匈奴族群,目前尚缺乏人骨科学测定数据,但参照其他邻近地区的相关数据,匈奴人群属于北亚蒙古人种,此可列入人群种属的第5组。

考古学文化的佐证与媒介

典籍记载的人群族性名号,其所涉及的时间与地域一般均比较广泛,因此与其相对应的出土人骨形态研究的范围,亦随之宽泛而缺乏基本的准确性。但是,特定时间与地域的考古学文化,不仅可以充当人群族性名号与人群种系类型之间的联系媒介,而且还是一种检验与印证的文化佐证。

不同考古学文化之间的分野,虽然不能等同或代表人群,但可以某种程度地反映人群区别的轮廓。这种人群区别大多是文化意义层面的分群,并非与族群相应与一致,但无疑是族群辨识的一个基础。赵国北疆地区存在着5支年代、地域和特征各不相同的考古学文化,其中的差异隐约代表了不同人群的分野轮廓,并且与人群族性、种系之间还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照应。

毛庆沟型文化 年代涵盖春秋晚期至战国

白燕杏花 成就陶寺

——写在《太谷白燕考古》出版之际

座谈会上做了“晋文化问题”发言,公布了这首七言诗,两次提到了“白燕”:作为考古学命题,“晋文化”有它的界定范围。山西中部以太谷白燕为主的工作,证明它上起六七千年间,下至三千年左右,文化连续性清楚。大约五千年以前属于北方古文化边缘地带。山西南部,如运城以南的西南一角,以及垣曲—平陆濒临黄河一带属中原地区古文化边缘地带。时间界限,上不起自周初分封,下不至三家分晋为限。大致上起四五千年间,下至秦统一前。[苏秉琦《晋文化问题——在“晋文化研究会”上的发言(要点)》,收录在苏秉琦《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18页。]

请注意此处的白燕,“大约五千年以前属于北方古文化边缘地带”。

会后,他到陶寺考察并就陶寺发掘报告编写及有关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陶寺是中原的文化,但又不是完全是中原的文化。陶寺的甕、鬲很发达,有朱绘、彩绘龙纹陶甗,有彩绘黑皮陶器,从中可以看见,它包含了北方的因素,根与北方有关系。不妨说,陶寺是两块石头碰出的火花,即:华山脚下的仰韶文化同燕山一带红山文化两大文化系统在汾河湾旁交会与碰击出的火花,文明的火花,人类智慧的花火。……对于陶寺的一些文化因素,若在本地(指晋南)庙底沟二期文化中找不到根源,就应到北方去找。太谷白燕是北方到陶寺之间的中间站,值得注意。[苏秉琦《关于陶寺发掘报告编写及有关问题》,《苏秉琦文集(三)》,文物出版社,2009年9月。]

再请注意他说的,“太谷白燕是北方到陶

晚期,分布地域与毛庆沟—饮牛沟组大致重合。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的墓葬流行羊、牛的头蹄殉牲,随葬器物以繁杂的铜饰件、铜牌饰为主。晚期阶段的墓葬殉牲现象减少,并出现一批以随葬铜带钩为主的简单墓葬。该文化早期阶段人群大致与北戎部族相对应,人群种系以东亚蒙古人种为主体。

新店子型文化 年代相当于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分布范围与新店子组基本相同。墓葬流行以马、羊、牛的头蹄骨作殉牲,随葬品缺乏陶器,以种类繁多的铜牌饰、饰件等为主。此文化大致与诸胡系统的林胡、楼烦相对应,人群种系以北亚蒙古人种为主体。

忻州窑子型文化 年代相当于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分布地域与忻州窑子组基本重合。墓葬流行羊、牛、马的头骨作殉牲,随葬品以繁杂的铜牌饰、饰件为主,陶器简单但常见,主要是一种罐类。此文化人群具有诸戎、诸胡的并存或混合的性质,人群种系包含东亚、北亚两个类型。

赵文化 年代集中于战国晚期,阴山南麓普遍有分布。墓葬不见殉牲,随葬品简单,以铜质或铁质的带钩最为常见,少数大型墓有较多的随葬陶器。赵文化无疑属于北上的中原人群,其种系以东亚蒙古人种为主。

西沟畔型文化 以准格尔旗西沟畔墓地为代表,年代约在战国晚期至秦统一之前,分布于阴山南麓至鄂尔多斯高原。墓葬存在少量殉牲,随葬品以各类金银饰件、兽形牌饰为特色。该文化大致与匈奴部族相应,种系属于北亚蒙古人种。

上述5种类型的考古学文化,大致分别与人群种系的5个组相对应,同时又与戎、胡、赵等族群或族性照应。毛庆沟型文化,早期阶段以东亚蒙古人种的诸戎部族为主,战国晚期则涌入了中原系统的赵人。新店子型文化,文化内涵与毛庆沟型早期相似,但人群属于北亚蒙古人种的诸胡部族,因此说明诸戎与诸胡虽种系不同,但两者具有较强的文化共性。而忻州窑子型文化,包含戎、胡两类人群,反映了戎、胡两种文化以及东亚、北亚两个种系的融合。赵文化分布较为广泛但集中于战国晚期,是赵国经略北疆时期中原人群集中涌入的写照,其趋向是逐渐与诸戎族群相融合,但与诸胡族群较为疏远。西沟畔型文化,文化内涵及人种类型与新店子型最为接近,但墓葬文化已出现明显的差别,代表着一种新兴的匈奴文化开始占据阴山南麓地区。

赵国开辟与经略阴山南麓的北疆,造就了阴山长城沿线居民人群的新结构。考古学文化隐约反映了人群的文化分野轮廓,墓葬人骨形态研究彰显着人群种系之别,两者综合起来与典籍记载的族群名号有某种程度对应。春秋晚期以来,北戎、林胡、楼烦、匈奴等名号的人群,相继交错活跃于阴山南麓一带。战国晚期,赵国的长足北进与北疆的大幅拓展,促进了这一地区人群结构及成分的巨大变化,戎、胡、赵等三类人群错居互动,后期诸胡之中又出现了匈奴人群。赵国积极开拓北疆地区的进程,正是阴山长城沿线居民发生剧烈交融的历程。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赵国北疆地区的居民构成与文化融合(23BKG01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寺之间的中间站”。说到底,就是将白燕与襄汾陶寺联系起来一起来了。

张忠培先生怎么研究白燕？

先说白燕。在我看来白燕2号房址值得重视(图2)。这是一座袋状地穴式双间房屋,由南间、北间和长方形过道组成。南间为椭圆形袋状,东西口径3.06米、底径3.72米;南北口径1.9米、底径2.8米;穴壁残高1.48米;北间是在过道北端向西掏进的一个底部边长2米左右呈抹角方形的穹庐顶窑洞。从居住面到顶部为1.86~2.04米。接近居住面的填土中有大量木炭、烧土块、草泥土和少量白灰面。填土件有大量碎陶片,共复原20多件彩陶,10多件素面及绳纹陶器,其中有釜形甗、小口瓮、壶、长颈壶、夹砂缸、泥质罐、夹砂罐和双层折腹盆。(下转7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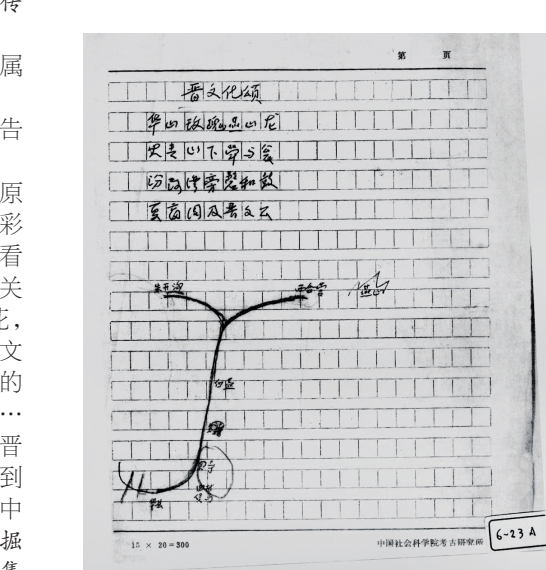


图1 苏秉琦先生《晋文化颂》手稿(1985年)(苏秉琦《考古手记》之《中华文明的新曙光》“Y”字形文化带示意图)